

从盘龙城遗址兴废看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

盛 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盘龙城遗址从普通据点发展成区域性中心城市到最后废弃的发展历程折射出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过程。盘龙城随二里头文化的进入而兴起，并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在此交汇的文化背景而开始在江汉地区确立起较为特殊的地位，进而为之后的崛起奠定基础。二里冈文化的进入使盘龙城发展成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等级最高的中心城市，并以此为据点形成了在该区域强势扩张的局面。其中，在江汉平原东部、赣鄱地区和洞庭湖东部地区，中原文化的进入表现为文化势力的主导地位和多层级聚落体系的设置，而在江汉平原西部及洞庭湖西部地区，中原文化的进入则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文化接触。商时期中原文化对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经营重心显示出区域的差异性，这从侧面反映出资源获取是其向南扩张的重要动机。至中商偏晚阶段，盘龙城遗址遭到废弃，中原文化向北撤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地方青铜文化随后兴起并发展，但两地间的文化联系并未断绝。

关键词：盘龙城遗址；夏商时期；中原文化；江汉平原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abandonment of Panlongcheng, which evolved from an ordinary settlement into a regional center,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s in the Jiangnan Plain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 in the Xia-Shang period. Following the expansion of Erlitou culture, Panlongcheng settlement flourished and gained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Jiangnan Plain because of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s the meeting point of Erlitou culture and Xiaqiyuan culture, which also set the foundation for its upcoming rise in the Shang Dynasty. As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Erligang culture, Panlongcheng settlement developed into the top central city in the Jiangnan Plain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 which further promoted the aggressive expansion of Erligang culture as a stronghold in this area. In eastern Jiangnan Plain, Ganjiang-Poyanghu region and eastern Dongting plain, the expansion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 is manifested in its dominant posi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tiered settlement structures. However, in the western Jiangnan and Dongting plains, the expansion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 manifests itself a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with the local culture. Such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s management in this area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reflects the major motive of its southward expansion is to obtain resources. In the late phase of mid-Shang period, the city was abandoned following the retreat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 from this area, since when local bronze cultures had sprung up, whi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is area had never been cut off.

Key Words: Panlongcheng site, Xia-Shang period, Central plain culture, Jiangnan Plain

^{*} 基金项目：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炭河里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CKG013）。

盘龙城遗址是商王朝在中国南方地区设立的一座重要城市,同时也是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扩张过程中所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中心据点^[1]。过往研究已表明,盘龙城遗址在夏商王朝经略南方的过程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2]。近年来,盘龙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化^[3],以及江汉平原和周边地区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4],为进一步考察盘龙城遗址与夏商时期中原文化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本文试以盘龙城遗址的兴废为视角,观察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过程。

一 盘龙城遗址的兴废过程

《盘龙城》报告曾将遗址细分为七期,一般认为这一分期方案虽然过细但大体可信。本文以这一分期结论为基础,结合对相关单位年代和性质的判断,考察盘龙城遗址的兴废过程。

盘龙城遗址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见于后来的城址南部一带,只发现少量的灰坑和文化层,以79HP3TZ33⑨A、79HP3TZ33⑨B、79HP3TZ30⑨A等单位为代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79HP3TZ33⑨A:1罐、79HP3TZ30⑨A:2罐、79HP3TZ32⑧:9隔^[5]等分别与驻马店杨庄遗址T15②:20罐^[6]、二里头遗址Ⅲ·VH240:61罐和82IXM9:1隔^[7]等器物的形制特征一致,后者年代均集中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故可大致推断盘龙城遗址兴起的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晚期。盘龙城遗址第二期遗存的分布面积相对扩大,王家嘴、李家嘴、杨家嘴等地点均有这一时期遗存发现,不过数量仍然较少,遗迹类型主要为普通灰坑和小型墓葬。该期年代在报告中虽也被推定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但多数单位出土器物已表现出更多接近二里冈文化的特征,因此有学者将其修正为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8]。从文化面貌上看,盘龙城第一、二期的遗存主要由本地龙山时代文化子遗、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不同来源的因素构成^[9],但受限于已发现的遗存数量,其文化性质尚难断

定。总体而言,盘龙城遗址在第一、二期面积不大,遗存数量较少且等级较低,暂且可将其看作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一处普通聚落点。

从第三期开始,盘龙城聚落可看出明显变化^[10]。首先是出现了一批高等级遗迹。遗址在第三期兴建起大型的夯土台基,可能存在高等级的大型建筑,标志着盘龙城作为高等级聚落的功能已初步形成。至第四期,随着城墙、壕沟和大型夯土建筑等高等级设施逐步完工^[11],盘龙城作为大型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凸显。与此同时,代表贵族阶层的高等级墓葬至迟于第四期开始出现,至第五期后等级进一步提高,出现如李家嘴M2等迄今已发现的商代早期等级最高的墓葬^[12]。其次,盘龙城的范围明显扩大。目前所知在王家嘴、李家嘴、杨家嘴、小嘴、杨家湾、楼子湾等地点都发现较为丰富的遗存,各类性质的遗迹如灰坑、窑址、墓葬以及可能与冶铸工业相关的灰烬沟^[13]等较密集地分布于上述地点,反映出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再次,遗物的多样性明显增加。涵盖陶器、铜器、玉器、骨器、漆木器以及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多种类别,且器物风格更加多元化,既有大量来源于商文化的器物,部分器物还衍生出明显的地方变体,同时还可能有来自长江下游、赣东北、鄂西峡江及澧水下游等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表明随着盘龙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对于周边地区人员及资源的吸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综上所述,自第三期后随着盘龙城遗址各类功能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遗址的等级地位明显提高,规模不断扩大,聚集了更多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员和资源,已发展成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等级最高的中心城市。

盘龙城遗址的城墙、壕沟和城内的大型建筑大约在第六期后就遭到废弃,不过此后在杨家湾一带出现的高规格墓葬和建筑等遗迹则表明盘龙城的高等级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并未完全丧失^[14]。盘龙城城市功能的消失约与其最后废弃的时间同步或稍早,大体属于盘龙城遗址第七期,该期体现遗址高等级的大型墓葬如杨家湾

M11、H6等已基本属于遗址中年代最晚的一批遗存^[15]，此后包括杨家湾在内的诸地点均已很少见到商代人类活动的痕迹，盘龙城遗址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彻底丧失，聚落也最终被废弃。

二 二里头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

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的地点除盘龙城遗址外，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还有荆州荆南寺^[16]、襄阳法龙王树岗^[17]、钟祥乱葬岗^[18]和大悟李家湾^[19]等遗址。荆南寺遗址位于汉水西部的长江沿岸，二里头时期的遗存发现相对较少，以H23、H36②、T48④E等单位为代表，时代属二里头文化晚期^[20]。从文化面貌看，其文化因素来源相对比较复杂，除盆形鼎、花边口沿罐、卷沿鬲、大口尊等属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外，还包括竹节状细柄豆、凸肩平底罐、米粒纹釜等鄂西三峡地区及江汉西部自身的文化因素。法龙王树岗和乱葬岗均位于汉水西岸，出土陶器如盆形或罐形鼎、花边口沿圆腹罐、深腹罐、大口尊、浅盘豆等，时代亦大体属二里头文化晚期，性质属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法龙王树岗、乱葬岗面貌接近的遗存还见于其上游的郧县李营^[21]、丹江口熊家庄^[22]、淅川下王冈^[23]及南阳盆地的方城八里桥^[24]、邓州穰东^[25]等遗址，学界一般将这类遗存统称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冈类型^[26]。因此，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经南阳盆地沿汉水南下应当是其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一条主要线路。李家湾遗址位于汉水东部，其二里头时期遗存的面貌可能与盘龙城遗址较为接近，出土的带鸡冠状鬲的甗或盆、花边口沿罐、带按窝的鼎足、大口尊等均为比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盘龙城和李家湾所在江汉东部地区向北沿今京九线越过桐柏山即为二里头文化杨庄类型分布区^[27]，已发掘的遗址有信阳三里店^[28]、驻马店杨庄^[29]等遗址。该类型的一些地域特征，如流行肩部不明显的大口尊以及陶器中红陶或褐陶数量相对较多等，也为盘龙城和李家湾遗址所共有，故江汉东

部地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由中原地区沿今京广线南下，跨过桐柏山与江汉平原之间的陆地通道后向南传入。二里头文化到达长江沿岸后继续利用长江通道向周边扩散，其中溯江而上可影响鄂西三峡地区，沿江而下则进入赣江下游及鄱阳湖地区^[30]。

总体来看，盘龙城遗址的兴起与中原文化南下的背景密切相关。从地理位置上看，盘龙城遗址位于汉水与长江这两条水系的交汇口附近，其中汉水是二里头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一条主要通道，而长江则是其进一步往上游和下游发展的主要线路，故这两条水系对于中原文化的南下扩张发挥了重要通道作用。因此，尽管盘龙城遗址在当时的等级地位并不突出，尚不具备作为区域性中心聚落的规模和功能，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却是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其他同时期遗址所不具备的。此外，从文化背景上看，盘龙城遗址所在的江汉东部地区除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外，也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所波及，因此当时两支最主要的文化势力很早就盘龙城遗址交汇。当商王朝建立后，作为下七垣文化主要继承者的二里冈文化也很早就进入并控制盘龙城遗址。总而言之，正是基于地理和文化的双重优势，凸显出盘龙城遗址在二里头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商时期该遗址发展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三 二里冈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扩张

二里冈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时代大致相当于盘龙城遗址的第三期，即二里冈文化下层一期偏晚阶段^[31]。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经营南方的重心似乎主要放在对盘龙城据点的控制和建设上，暂未表现出向周边扩张的迹象。而自盘龙城遗址第四期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之后，随着盘龙城遗址城市功能的完善和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的凸显，二里冈文化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随之向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多个方向扩张。

在江汉平原东部地区，除盘龙城遗址外，

据过去调查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遗址数量至少有数十处^[32]，但只有少数开展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发表材料的有孝感聂家寨^[33]、新洲香炉山^[34]、云梦小王家山^[35]和安陆晒书台^[36]等。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这些遗址的时代多集中于二里冈上层至中商时期，陶器面貌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几乎一致。其中，部分遗址中出现的文化遗存还显示出其在本区域相对较高的等级。譬如云梦小王家山遗址，过去曾发现有建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城垣和城壕，表明其很可能是一处等级较高的重要据点。此外，距盘龙城遗址较近的袁李湾遗址发现有中商时期的铜甗^[37]，不远的鲁台山遗址也曾出土二里冈上层时期的铜爵^[38]。另外，黄陂矿山水库工地还见有二里冈上层时期的甗、戈等铜器^[39]，黄州下窑嘴发现中商文化时期的鬲、觚、爵、甗等16件铜器^[40]，距离随州庙台子遗址不远的淅河镇也出土了觚、爵、甗等成套的青铜器^[41]。这些地点虽然仅有零星青铜器出土，但多数可见觚、爵配套的现象，暗示它们的出土背景很可能是具有一定等级的贵族墓葬，尤其是黄州下窑嘴地点出土铜器组合基本完整，墓室平面面积超过3.5平方米，其规格若参照盘龙城遗址也应是属于第二等级的墓葬^[42]。由此看来，上述新兴聚落在当时的地位可能都不低，特别是云梦小王家山遗址和黄州下窑嘴遗址等，应是中原王朝为统治需要专门在盘龙城遗址周边设置的次一级重要据点^[43]。这些表明江汉东部地区自二里冈上层时期或许已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次一级普通城市和普通村落这样层次分明的聚落结构，其背后很可能暗示中原王朝的政治权力已建立起对此区域的有效管辖。

在赣鄱地区，黄梅意生寺^[44]、九江荞麦岭^[45]、龙王岭^[46]等多个遗址自盘龙城遗址第四期出现后，遗存性质基本与盘龙城保持一致，表明这一区域自二里冈下层二期开始应当已被纳入中原势力的控制范围。依赖于这些新设立的据点，二里冈文化还进一步表现出向赣江下游和鄱阳湖地区持续扩张的态势。从目前材料来看，包

括德安石灰山^[47]、陈家墩^[48]和瑞昌铜岭^[49]等多个地点至迟在二里冈上层时期都明显可见来自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强烈影响，说明这一时期在中原文化扩张背景下遗址点的数量不断增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考虑到鄂东南及赣鄱地区存在丰富的铜矿资源，以及荞麦岭、铜岭等遗址均发现了明确与冶炼活动相关的遗存，故商王朝较早进入这一地区或许是出于获取铜料的目的。

在洞庭湖东部地区，随二里冈文化的进入而新出现的遗址有铜鼓山^[50]、城陵矶、大矾头等多处，但仅铜鼓山遗址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从出土陶器的面貌来看，以鬲、爵、甗、盆、罐等为主，总体特征几乎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一致，显示出二里冈文化以盘龙城遗址为据点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态势。

在江汉西部地区，这一阶段的遗址主要有荆州荆南寺^[51]，此外其西部的枝城曾发现一件中商时期的青铜甗^[52]。荆南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目前来看，商文化进入江汉西部地区的时间大致在二里冈下层二期，典型单位如荆南寺遗址H17、H70⑤、H70③等。这一阶段该地区的文化因素构成仍比较多元，其中既有明显来自商文化的因素、以釜为代表的本地文化因素，又有来自澧水下游、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且商文化因素在整个遗存中并不占据优势地位，这与之前论述的江汉平原东部地区、鄂东南及赣鄱地区和洞庭湖东部地区的情况有明显差异。正因如此，有学者推测荆南寺遗址在当时可能是长江沿岸的一处自由贸易港^[53]。至二里冈上层时期后，中原文化对本地区的扩张显得更为强势，可见荆南寺遗址中的商文化因素比重在不断提高，且相较于盘龙城遗址中的商式器物不断出现的地方化倾向^[54]，荆南寺遗址中以陶鬲为代表的商式陶器则明显表现出更为接近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的特征^[55]，这从侧面反映出江汉西部地区出现商文化因素大部分都应当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和持续传入的结果。

洞庭湖西部地区也受到来自商文化的影响，主要遗址有石门皂市^[56]、宝塔^[57]和澧县斑

竹^[58]等。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上述几处遗址在商文化进入之前都已有本地居民活动,因此它们并非是因中原文化的进入而兴起的。商文化进入之后,来自中原地区的因素比重并不高,其中较多的商式陶器及其纹饰还表现出本土化的做法^[59],而占据遗存主体的仍为本地传统的文化因素。这些现象均表明商文化对该地区的进入可能以间接文化影响为主,或进一步说是以邻近的江汉平原西部为媒介完成的。

总体来看,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入和扩张表现出东西区位上的差异。在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及赣鄱地区以及洞庭湖东部地区,许多遗址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向外传播的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其文化面貌与盘龙城几乎一致,且与盘龙城遗址的文化演进也保持着相同节奏,显示出中原势力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中原文化的进入是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对这些区域形成强势的文化占领,同时建立起多层级聚落体系,背后隐含的是政治权力对该区域的有效管辖。相较而言,在江汉平原西部和澧水下游地区,中原文化的进入只局限于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接触,这些区域的文化面貌始终以本地传统因素为主,表明商时期中原文化对该区域的进入虽然保持了文化影响上的持续性,却始终未占据文化性质的主导地位。造成上述区域差异的原因,笔者推测是商王朝主动选择的结果。由于鄂东南及赣鄱地区可能是中原铜料及原始瓷器的重要供应地,而盘龙城或是这类资源的集散地,盘龙城周边向北和向随枣走廊及汉水沿线分布的据点则进一步为运输线路的畅通提供保障,因而其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性相对更高,自然会成为经营重心所在。因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时期中原王朝向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入是以资源获取为导向的扩张。

四 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地方青铜文化的兴起

盘龙城第七期后遗址遭到废弃。盘龙城遗址的废弃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对整个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变动都产生了联动性的影响,

即许多遗址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废弃,各具地方特征的文化开始兴起或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过程不但在陶器面貌上有明显反映^[60],铜器面貌上也有同样的表现。

首先表现在器类的选择上。殷墟时期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的重心仍然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酒器,但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则明显不同。以大洋洲商墓为例^[61],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62],大致与中原文化退出的时间相接,但该墓出土的48件青铜礼器包含鼎、鬲、甗、豆、簋(报告称为盘)、甗、壶、卣、觚等十种器类,却未见觚或爵。数量最多和占比最大的是鼎,在铜容器中占据半壁江山,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器类。此外,如甗形鼎、三足卣等器物形制虽是借用了中原地区甗和卣的外形,但却将原有的圈足也改成了三足的形式,表现出“类鼎化”的倾向。江汉东部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已形成深厚的用鼎传统,以上迹象似乎说明当中原文化消退后,本地吸收自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快就在传统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与中原相异的发展方向。另外,大洋洲商墓中出土青铜工具和农具的比重非常大,也明显不同于当时中原地区大型墓葬对于随葬器类的选择。此外,在长江沿线,虽然与中原类似的觚、爵等铜器仍有零星发现,时代大体属殷墟二期前后^[63],但其出现或与武丁时期商文化的再次南下有关,因而其使用者很可能是商人而非本地土著居民^[64]。实际上,这些地区当时比较流行的器类应当是造型高大的尊和罍^[65],而非体量较小的觚和爵。这两类铜器虽在器形上可能模仿了二里冈文化的尊和罍,但又从多个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征^[66],明显不同于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

其次是表现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其实,相比于青铜器在器类和形制上的创新,装饰的地方化似乎技术难度稍小,因而表现也更为突出,对此以往学术界已有比较详细的研究^[67]。大体来看,新干大洋洲商墓铜器群中流行的燕尾纹以及大量装饰写实性动物形象的附件都是基本不见

于中原铜器上的装饰风格。尊、罍等器物上的兽面纹尽管是其腹部常见的主纹饰,但部分兽面纹的组成明显较分散,整体风格显得粗糙。而相较于殷墟铜器上厚重而低矮的扉棱,这些尊、罍上习见的勾云形扉棱亦更薄更高。此外,还惯于在尊、罍器体的肩部装饰写实的动物形象,如牛首、羊首和扁体的立鸟等,且往往形体较大,也是不同于殷墟青铜器的装饰风格。

总而言之,这些大体兴起于盘龙城遗址废弃之后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器在总体面貌上与此前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发现的中原式铜器以及同时期的殷墟青铜器都存在明显的反差,表明这一阶段的青铜文化已基本脱离了中原文化的范畴而出现鲜明的地方特征。因此,盘龙城遗址的废弃是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随着它的废弃并带动周边大批遗址点的废弃,区域性青铜文化得到发展,中原文化从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退出。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经汉水通道和豫南一带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并以长江沿岸为通道逐步向周边扩张。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势力尚不如二里冈文化强大,所见遗址点的数量较少,遗存也不丰富,更未见城址一类的高等级遗存。盘龙城的兴起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且凭借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上的双重优势,其重要性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便已凸显出来。二里冈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后不久,其势力就开始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首先通过占据和建设盘龙城,中原文化在二里冈下层一期阶段就已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据点。至二里冈文化下层二期开始,中原王朝对盘龙城的建设趋于成熟和完善,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成为商文化向南扩张的中心据点。随着盘龙城等级地位的提高,中原文化进入

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向东进入到赣江鄱阳湖地区,向南进入洞庭湖东岸,向西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及澧水下游地区,而在盘龙城所在的江汉平原东部及随枣走廊地区则进一步建立起多层级的聚落体系。从中原文化进入的结果来看,中原势力在东部地区显示出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而在西部地区虽然保持了文化影响上的持续性,却始终未取得文化性质上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果似乎暗示中原王朝的经营重心仍集中于前者,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其向南扩张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资源所决定的。至中商偏晚阶段,盘龙城遭到废弃,进而对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变动产生联动性影响,造成一大批关联次级城市先后遭到废弃,使得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渐兴起,中原文化也由此从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向北撤出。在此之后,商文化虽未如之前那样全面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但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却并未断绝,譬如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多个地点就零星出土了典型殷墟阶段的青铜器,可能是中原文化再次南下的印证,而来自湘江下游地区的硬陶甗持续见于作为商王朝都城的殷墟^[68],则暗示两地以产品为导向的物质文化联系仍然得以延续。

注释: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本文所引盘龙城遗址的材料如无单独注明,均出自该报告,并简称为《盘龙城》。此外,本文所谓夏商时期的中原文化指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中商文化和殷墟文化,年代框架采用《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体系(参见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本文所指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地理范围,主要包括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鄂东南及赣鄱地区。

[2] a.徐少华:《试析盘龙城遗址的文化特征和重要地位》,冯天瑜、刘英姿主编,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 委员会办公室编：《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5~60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 b.张昌平：《关于盘龙城的性质》，《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 [3] a.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 b.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2012—2017年盘龙城考古：思路与收获》，《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 c.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各地点历年考古工作综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 [4] a.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年；
- b.孙卓：《论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7年；
- c.陈晖：《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9年。
- [5] 《盘龙城》报告中79HP3TZ32③：9鬲属第二期遗存。本文将第一期及第二期中年代特征较明确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器物都归为最早阶段的遗存，代表盘龙城的兴起。
- [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125~126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 [7]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02、2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 [8] 李丽娜：《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
- [9] 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八），第188~18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0] 同[3] a。
- [11] 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 b.同[3] a；
- c.蒋刚：《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 [12] 郜向平著：《商系墓葬研究》，第5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3] 邱诗莹：《浅论盘龙城灰坑沟遗迹》，《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 [14] 同[3] a。
- [15] 盛伟：《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 [16] 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荆南寺》，第31~14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7] 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 [18] 荆州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钟祥乱葬岗夏文化遗存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
- [1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悟县城关镇双河村李家湾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 [20]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 [21] 武汉大学考古系、鄖阳博物馆：《湖北鄖县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6期。
- [2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丹江口市熊家庄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第349~350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 [23]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冈》，第264~30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浙川下王冈：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57~390页，科学出版社，2020年。
- [2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穰东遗址

- 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 [26] 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6~97页。
- [27] 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5~96页。
- [2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 [2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北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92~187页。
- [30] a.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结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6期；
b.同[20]。
- [31] a.同[8]；
b.同[11]c。
- [32] a.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古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
b.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黄陂两县部分古遗址复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 [33]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 [34] a.香炉山考古队：《湖北武汉市阳逻香炉山遗址考古发掘纪要》，《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b.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新洲香炉山遗址（南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
- [35] 傅玥：《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7~18页，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0年。
- [36] 余从新：《安陆县晒书台商周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 [37] 熊卜发、鲍方铎：《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该器腹部较高、腹底圆凸，腹部饰粗线的兽面纹，与盘龙城所见铜斿特征基本相同，本文认为其年代应为中商偏晚阶段。
- [38] 黄铨、况红梅：《近年黄陂出土的几件商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 [39] 郭冰廉：《湖北黄陂矿山水库工地发现了青铜器》，《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 [40] 黄冈地区博物馆、黄州市博物馆：《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嘴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6期。简报中将下窑嘴商墓年代判断为商代前期，依据本文使用的年代学体系，将其修订为中商时期，下文同。
- [41]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 [42] a.蒋刚：《湖北盘龙城遗址群商代墓葬再探讨》，《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b.郜向平著：《商系墓葬研究》，第279页。
- [43] 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 [4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工作站：《湖北黄梅意生寺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6年第4期。
- [4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江县荞麦岭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4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江县龙王岭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 [4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 [48]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县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陈家墩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 [49] 刘诗中、卢本珊：《瑞昌市铜岭铜矿遗址发掘报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博物馆主编：《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第1~90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 [5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第29~45页，

- 《求索》杂志社, 1989年。
- [51] 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荆南寺》,第31~148页。
- [52] 黎泽高、赵平:《枝城市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9期。
- [53] 同[43]。
- [54] 孙卓:《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演变初探》,《江汉考古》2017年第3期。
- [55] 张科:《盘龙城与荆南寺出土陶鬲比较研究》,《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 [5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57] 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第11~18页,岳麓书社,1987年。
- [5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商周时期古遗址调查与探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第1~10页。
- [59] 豆海锋:《试论湖南澧阳平原商时期考古遗存的发展阶段》,《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 [60] 同[15]。
- [61] 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第8~14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 [62] 施劲松著:《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第88~8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63] 施劲松:《江汉平原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 [64] 何赞:《关于岳阳铜鼓山遗址新出土青铜器的相关思考》,郭伟民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28~23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65] a.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b.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鬲》,考古杂志社编辑,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5集,第116~128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 [66]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鬲》,考古杂志社编辑,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5集,第116~128页。
- [67] [日]难波纯子著,向桃初译:《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 [68] a.牛世山:《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附论中原和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的来源》,《考古》2016年第8期;
b.黎海超、耿庆刚:《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产地研究——以郑州商城和殷墟为中心》,《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